

深圳农村经济系列丛书

SHEN ZHEN NONG CUN JING JI XI LIE CONG SHU

绿色的小屋

7.65

)

特约编辑：温定凯

封面设计：谢 鸿

深圳农村经济系列丛书（之一）

绿色的冲击

——来自深圳农村外向型经济的新发展

万 钧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山友电脑快印部排版 上海市杨中印刷装订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32 字数 750,000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208-01133-8/F·211

总定价 29.50元（五册）

《深圳农村经济系列丛书》序

李 广 镇

深圳农村经济，在十年改革开放中经历了一条不寻常的发展道路，这也是一条金色的道路。我市以及来自北京、上海的部分经济理论工作者和报告文学家撰写的这套《深圳农村经济系列丛书》，反映了深圳农村的深刻变化，宣传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讴歌了深圳农民改革创新、艰苦创业的精神，丛书忠实地记录深圳农村十年光辉的道路，这无疑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农村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一是传统落后的产业结构，向三大产业整体协调发展的新型结构转变。农业、工业的产值比重发生根本变化，外向型乡镇工业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原来以粮、油为主的农业单一生产结构，已被以禽畜、蔬菜、水产、水果四大鲜活商品基地为主的优化结构所代替。农村第二、第三产业逐步发展，但农业并不萎缩，农产品稳步增长。二是封闭的自给性农业向创汇型的商品农业转变。经过几年努力，逐步形成以“特区、香港”两个市场为目标的贸工农生产体系，商品率、出口率不断增加。三是单家独户“小而全”的经营，向着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大农业方向转变。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几个层次一齐上”的发展方针，各种生产要素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新的组合，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

改革，是深圳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

——不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农村流通体制。除了粮食实行合同定购制度外，全面取消了统派购制度，农副产品全面放开价格。多形式、多渠道、少环节的农村商品流通网络已经形成，农村整个市场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面向市场，运用价值规律，引导资金投向建立专业化经营服务的新型企业。华宝牧工商联合公司、宝安县养鸡公司、光明华侨畜牧场等十个单位和经贸系统有出口权的农副产品贸易中心，各自形成专业化经营服务的新型企业，带动经济发展。

——改革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逐步推行股份合作制。在农村推行集资股份企业的同时，把村办企业固定资产折股分解到村民作为股权，消除长期以来集体财产权属不明，分配无制度等弊端，从而密切干群关系，促进基层干部廉政建设。

——改进“外引”工作，兴办外向型乡镇企业，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大的活力。

在深圳农村经济建设中，涌现出大批有技术、善管理的经济强人，他们是商品经济大潮中的时代弄潮儿。通过学习、实践，他们增长了才干，提高了水平，创造了许多业绩，在参与国际经济交往中大显身手，作出较大的贡献。

这套丛书，选择一批在我市农村经济建设中卓有建树、值得纪念而富有特色的单位和个人入书，生动地、真实地记录了这些单位和个人在十年改革开放历程中的成绩。她将给广大读者带来鼓舞和启示。

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参加写作的作家们，为我们出版了这套丛书。

一九九〇年九月

目 录

引 子	(1)
1. 运筹帷幄	(5)
孺子牛看到了国际市场	(5)
唤出一个新宝安	(6)
接力棒与农业角逐	(7)
2. 深圳宣言：走出绿色古堡	(11)
艰难中的抉择	(12)
多元化农业生产	(15)
阳光带的灿烂农业	(19)
3. 翻身梦	(22)
边境贸易：致富起点政策	(22)
农与富终于结了亲	(25)
山坳里的“三级跳远”	(28)
人生的一个圆	(31)
4. 成功的鸡模式	(35)
新界的陌生客人	(36)
荒野里的崛起	(38)
台阶与层次之间	(40)
龙和舞龙人	(42)
竞争体系	(43)
巨头与鸡模式	(45)

5. 种的突破	(50)
一张光明牌	(51)
芒果大地震	(55)
良种意识	(59)
6. 蚝业的变迁	(64)
蚝与蚝广告	(64)
东洋技术落户沙井	(66)
现代蚝业与现代蚝民	(71)
二十世纪的忧患意识	(74)
7. 基围：一个由虾而享誉全国的名字	(77)
站在历史与未来之间	(77)
西海岸的招标热	(79)
“深圳牌”基围虾	(81)
奇迹的创造者	(83)
8. “广三保”的新名堂	(88)
巨无霸的力量	(89)
头脑型农民	(91)
猪与高技术	(94)
9. 生物链上的多重奏	(99)
果禽鱼的“三结合”	(99)
特区农民的生态意识	(102)
人与自然之间	(106)
10. 创汇“五味瓶”	(111)
火辣辣的滋味	(112)
“出口才够味”心态	(114)
走出辛酸的出口怪圈	(117)
甜蜜的输出口	(120)
苦恼的出口	(124)

11. 奉献的艰辛	(128)
姓“农”的张体能	(129)
使命感、赤诚的心和“技术权威”	(134)
加州鲈、铺路石与钟必华	(139)
12. 半边天的杰作	(144)
女人的农业与农业中的女人	(145)
热闹的“团”与爆棚的“班”	(149)
女能手大赛与女能手	(151)
13. 黎明,天边的绿色曙光	(155)
李广镇:深圳农业的深层意义	(156)
大企业的位置	(159)
金融业大输血	(161)
超越时代的绿色视野	(163)
城市化·农业·人	(168)

引子

七十年代末期，中国政治舞台的一系列变化，最终酿成了一场“经济大地震”。

经济体制的改革，改变了南国边陲的一切。

大地震为人们前途、命运、利益、权力的重新分配创造了一种可能。

这种可能是深圳从未获得的发展良机。

把握良机，就是把握了时代。

1978年12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中国人果断地宣称：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是工作重心。

象冬日的一股暖风，炎夏的一阵雨露。三中全会精神深深地渗入了宝安人的心。

紧接着，四中全会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农业生产力的25项政策和措施，揭开了农业大变革的序幕。

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启迪了地方领导人的思路。广东省与宝安县的干部们开始意识到边境农村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是发展多元化生产。

于是，酝酿已久的一整套战略设想终于大胆地摆了出来：在三、五年内将宝安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商品生产基地，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吸引港澳游客。

七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年头。深圳，这个共和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实的童话，开始了新的历史。

从中央到地方对这块土地所给予的特殊关注，使深圳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传播媒介，也使众多的学者发现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最初迹象。

1979年1月13日，一份中共广东省委的报告，递送到了国务院：广东省拟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与此同时，关于这一地区的一些战略规划构想也放到了国务院领导人的案头。

这些设想与几位高层领导人的思路是如此地合拍。于是国务院迅即发文批复：同意。新的深圳被描绘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相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和新型的边防城市。

197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蛇口创办工业区。

1979年3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
一座现代城市已呼之欲出。

4月。初春的北京黄沙漫舞。风尘仆仆地从南国赶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心里象揣着一团火。

广东一直被视为中国的南大门，如今要开放搞活，广东正憋着一股劲呢。

4月11日。中南海一间会议室里，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广东省委领导人习仲勋正在畅谈广东的优势发挥问题。

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工农业有一定的基础。自然条件十分有利。但所有这些长处都因政策原因而不曾发挥出来。

精神矍铄的邓小平一直坐在那把高靠背的藤椅上，静静地听着。此时他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把他考虑已久的一个想法道了出来：“可以划分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

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邓小平的大胆设想使在场的广东领导人神情为之一振，也使会场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在这次会议之后，党中央和国务院派谷牧带领一个工作组急赴广东、福建作具体考察，同两省领导人详谈发挥优势的问题。

中央的尚方宝剑就这样交到了广东领导人手里。

新的特殊探索很快有了一个暂时的名称——出口特区。仅仅在邓小平一番谈话的3个月之后，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就正式提出试办出口特区，深圳赫然排在头一批4个城市的榜首。

深圳的地位在节节上升。1979年11月，深圳由广东省、惠阳地区双重领导的半地级市，升格为广东省直接领导的地级市。翌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把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为特区全方位的经济探索铺平了道路，并明确指示广东要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15个月之后，深圳第三次升格为半省级市。至此，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深圳由一个边陲小镇一跃而为中国南疆一个地位显赫的大市。

深圳地位如此迅速的变化，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它既反映了中国高层领导人对开放的高度重视，又体现了他们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决心。

从1981年到1982年，中央连续发了3个文件，进一步规定了办经济特区的各项方针政策。在一次谈话中，谷牧概括地将这些特殊政策归结为4条：特区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吸收和利用外资，产品主要供出口，其经济是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特区内经济活动，实行以市场调节为主；对来特区投资的外商，在税收等方面给予特殊的优惠和方便；经济特区内实行不同于内地的管理体制。今天，当我们考察深圳农业发展道路时，便可以发现这4条中，几乎每一条都与农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上到下的热切关注，许许多多的优惠政策，不仅仅为深圳工

业的腾飞提供了条件,也为深圳农业创造了“一步登天”的良机。世界最新的耕作技术、养殖技术、栽培技术,连同七十年代最先进的农业机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驱动着总产值不足1.2亿的深圳传统农业向现代化挺进。

1. 运 筹 帷 幄

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模式正在倾塌之中。

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的各种生产责任制，唤来了中国农业的春天。

深圳的农业奔跑着扑进春天。而两大市场的齐声呼唤，更催浓了这股春意。

农业需要远见。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尤其是特区农村。

孺子牛看到了国际市场

一头肌腱发达的牛悄悄地走进了深圳市政府大院。前倾的身躯与低埋的头，显出它背负的份量是多么地沉重。然而一只昂然抬起的前蹄与浑身暴突的筋脉，又使人感到它正在奋然前行。

孺子牛是雕塑家潘鹤的力作。它蕴含着对深圳人开拓精神的赞美。这是对深圳人毅力与雄心的高度概括。

孺子牛成了深圳人的象征。

如同孺子牛一样，深圳人仅仅用了短短两年时间，就在一片田野之上创建出一个现代城市的基本轮廓。

基本建设只是改变着深圳的外表，更深刻的是整个经济结构内部的变化和调整。

低埋着头的孺子牛，正积聚着浑身的力量，等待着更多奋力一搏的机会。

一个庞大的市场赫然出现在深圳农民的面前。

边境线的另一边，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开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如今，它成为东方大都市，一个举世闻名的购物天堂、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旅游中心。

富足的香港人特别偏好于饮食消费，他们的食物消费额占了消费总额的46%左右。

在香港市场上，蔬菜、生猪、活禽、活牛、塘鱼、水果、鲜蛋、鲜奶等鲜活农副产品，几乎全靠其他地方输入，自给率极低。1984年，香港自产食物消费额28.41亿港元，仅占食物消费总额的12%。

香港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进口农产品不存在关税壁垒，因而吸引着世界上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蜂拥而入。每天，香港人咀嚼着泰国的大米、美国的水果、南朝鲜的野味和台湾的塘鱼，食谱的国际化 and 输入自由化，使得任何一种农产品都有竞争取胜的机会。

香港的旅游业异军突起，全年抵港旅客在八十年代初已高达2000多万人次。

.....

各种各样有关香港的信息源源不断，一刻不停地轰击着深圳人的大脑。

每一个信息都蕴藏着一种机遇。

如此庞大的市场需求。如此近的运输距离。如此可观的市场价格。机会真是太好了。

深圳的农民知道，他们必须抓住眼前的这个机会。丧失机会便意味着丧失发展。

唤出一个新宝安

对于八十年代初的深圳农村来说，外部环境的变化实在是太剧烈了。

接二连三公布的优惠政策，不断升格的城市规划，屡屡变动的

行政区划，大片的征地和搬迁，以及不断涌入的操着各种陌生口音的建设大军，都使深圳的农民们觉得异常新鲜。

城市建设与发展需要农村作为依托，而现代化的城市必须有城郊型的农业与之配套，深圳人从他们的菜篮子里悟出了这个道理。

特区的蔬菜贵如油。特区的禽畜供应严重短缺。

当八十年代初10多万建设大军呼啦一下涌入深圳时，毫无基础的深圳农村实在担当不起如今看来并不十分繁重的供应任务。

那时，刚刚成为深圳市市长的贾华屁股还未在办公室坐热，就不得不冒着风雨匆匆赶往潮汕搬援兵，终于请来了一班有经验的老菜农传授种菜技术，帮助特区农村发展蔬菜生产。

远水止不了近渴。负责财贸和商品供应的市政府领导人只得天天向邻近地区化缘。请求调入蔬菜，调入猪肉，调入水果。请求调入的东西太多了。薄弱的自给自足的农业，与特区的发展格格不入。

广东省与深圳市的领导们头脑是清醒的。变化中的深圳，得搞些适当的产业分工，尤其是要将自己的耕地优势转化为农副产品的商品优势。

于是，一个全新的着眼于发展搞活农村经济的新宝安诞生了。1981年7月，在深圳升格为半省级市的同时，宝安恢复了建制。

特区与宝安成了深圳市的两大块。特区内，工商业迅速发展，大量的农业用地变成了工厂、住宅区和商业区，耕地面积由原来的6.47万亩，锐减至1984年的3万亩，农业功能不断萎缩；而特区腹地的宝安农村，则挑起了“为特区服务、为出口服务”的两副重担。

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任务，也是时代给予他们的机会。

接力棒与农业角逐

陀螺般旋转的新宝安。

一切变化都如万花筒似地粲然。

面对市场，所有搞农业的人都在寻找着新的起点。

现代农业的大观园曾使老实巴交的宝安农民感到迷惘。

但那些睿智的父母官又让他们看清了去路。

如同一场接力赛跑，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已经先后有三位县委书记率领着这个边陲小县，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朝现代农业奋力冲刺。

方苞、李广镇与李容根。这三任县委书记都拥有丰富的农业基层领导经验，搞农业得心应手，每个决策都具备一种特有的才智和胆略。

无法想象，就凭着宝安的极为薄弱的农业底子，竟然能够迅速参与面向国际国内两大市场的大角逐。

然而，宝安偏偏参与了，并且在角逐中摘到了一颗又一颗的甜果。

方苞、李广镇以及1983年炎夏调到县里的李容根，对宝安的农业家底都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对宝安1700平方公里上的每寸土地都了如指掌。

宝安的东片与西片都靠海，这是两种不同环境的海。西片的浅海有大片的滩涂，可供发展蚝、虾、鱼的养殖；而东片的海滩是沙质的，海水清而深，足可耕海牧鱼，发展海水养殖。

每次下乡，穿行在连绵的丘陵之中，方苞和李广镇总是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南国的林果。全县有40万亩山坡地未得到很好的利用，如果能够将这些地改造成果园，同时发展配套的畜牧业，前景是相当乐观的。宝安有金龟桔和龙岗鸡之类的传统土特产品，更重要的是，发展畜牧业和水果业，都有足够的市场容量。

宝安农业应该跳出水稻、花生和甘蔗的模式而有所变化了。单一种植的小农业，一旦实现水产、水果、蔬菜、畜牧、粮食多头并进的大农业，就能换个样子。

为了这种大农业的构想，宝安的领导人沿着资金、技术、体制几条思路传递着他们的接力棒。

地方财政支援农业，是方苞与李广镇选择的一支经济杠杆。而李容根又将它运用得恰到好处。

对四大鲜活农副产品的基地建设，实行贴息贷款，保证为基地提供足够的生产资金。1984年到1985年银根较松的时候，这种贴息贷款一度多达2000万元。

千载难逢的良机把握住了。农业结构调整进行得相当平稳，不知不觉间，新宝安的农业已露出了锋芒。

集约化养鸡在县委书记的倡导下，终于蹒跚地迈出第一步。

欣喜之余，方苞、李广镇更被养鸡业牵住了心。他们殚思竭虑作出不甘平淡的谋划。为了扶持集体和个体养鸡业，深圳按照饲养一只鸡分配6元无息贷款的办法，鼓励集体和个人大办鸡场。到1986年宝安拥有226个鸡场的时候，全县投入的贷款有4450万元。

深圳的养鸡场果然成了鲜活商品出口的拳头。

养鸡业让宝安的领导人看到了大农业中农科技的重要性，在李广镇和李容根的关心下，农业、水产、林果、畜牧、农机等研究所一个个地建立起来。政府机构内，也适时地成立了县科委。科技兴农，不仅挂在领导干部的嘴上，写到政府工作报告里，而且落到了实处，县科委牵头组织开展了大量的农业科学研究，推广应用农业科技成果。

年轻的县委书记李容根揣着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的文凭，从李广镇手里拿过接力棒，他由衷地佩服前两任创业者的创造。

经济行家的县委书记喜爱思索。

政府调控农业。大农业的经济必须有大农业的管理；大农业又要求农业具体门类的专业化、细分化。方苞、李广镇创下的活鸡产供销“一条龙”模式作为一个典范，仍然不断地提供着有益的启示。

李容根和县委县府的一班有闯劲的领导人果断地从体制上动

开了刀斧。

取消农口各局，成立统辖农业的大农委，对农业实施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同时成立农业发展公司、畜牧发展公司、林果发展公司、食品发展公司、种养发展公司、水产公司、农机公司、水电公司等专业公司，负责农业生产、科研及农产品的收购、储存、加工、装运、销售等业务的组织实施。

象一道闪电。象一声惊雷。体制的更新使得整个宝安农业指挥系统焕然一新，从而为几十万亩农田的生产送去丝丝春意。

农业生产的方针在决不放松粮食生产之后，又添加了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搞创汇农业的内容，三头并进的农业尽管仍然带有中国农业的浓郁气息，但毕竟迅速地朝现代化靠拢了。